导　论

每一代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在某些特殊意义上，都是“自然的”,不变的和固定的。可是,多少千年以来,社会制度一直是连续地兴起、发展、衰亡并逐渐地被更适合于当时需要的其他制度取而代之。这本书指明，我们这些自认为最文明先进的国家，也同我们的前人一样，必须经历这种无穷变化的过程。正像古代苏莫尔人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文明已经消逝一样，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文明（它和过去的文明一样是会死亡的），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这种崩溃，不只是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道督所解析的、战争所带给我们并可以用真正的和平来挽救的“腐蚀性的崩溃”中进行着 并且是在战争虽可加速、我们或任何东西却不能阻挡的时代逐渐变迁中进行着。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现今的文明是否会变迁，而是它将发生怎样的变迁。它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适应过程，逐渐地、和平地过渡到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假使是由忿怒的反抗来代替这种适应的话，它可以整个垮台，使人类从社会紊乱和骚动时期的更低的水平上，来痛苦地建立新的文明，而在这种社会紊乱和骚动中，不只是旧秩序的弊病，而且连同它的物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知识的和道德的成就，都将丧失殆尽。

不幸的是，那些承认变化是无可避免的这种一般命题的人们，却不能了解什么是这种变化的规律所适用的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财产私有制是一切可能有的文明的基础，意思就是说，它与人类天性是那样密切地联系着，以致只要人还是人，它便与地球绕其轴心转动一样，是不会腐朽或被别的东西所代替的。可是，他们把位置弄错了。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不是个人财产的获得承认或获得保障，而是社会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

我们现在不妨冒着卖弄学问的嫌疑，把我们的意思，作出一个定义。我们所谓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我们所乐于称道的资本主义文明，意思是指工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广大的工人群众被彻底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以致沦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他们的生存、安全和个人自由，好像都取决于在国内占相当小的比例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这种少数人就是那些以谋取他们自己个人的私利为目的，占有并通过合法占有来管理社会中土地、机器和劳动力的组织的人们。

土地和其他生产财富的工具，变成了人数相当少的一个阶级的私有财产，并且这种占有所带来的公共责任，并不比一只表或一根手杖的占有所带来的为多；这种私有制构成了社会中其他的人们赖以谋生的那种局面的基础；而且，这种私有制又带来了对于作为国家命脉的商品及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权和组织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意义——这种惊人的局面，远不是人类的历史上万古长存和

遍地皆有的，它之成为美国文明的特征，只是最近三、四个世代的事；而在欧洲，也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在这个时期，由于乡村中土地租佃和农业方面的封建制度的逐渐没落，以及城市里工商业行会组织的重要性相对地降低，以致遗留下来的基地，被商业的冒险漫无约束地窃据了。我们知道，欧洲在封建制度和手工业行会兴起以前，它的文明，是建筑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家长制或等级制度等不同形式上面的。这些制度，在那时，好像是在人类天性里生了根似的，也好像和现在的资本主义一样，是不变的。再者，它们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之久，并且被设想出来和被纳入国家和教会的组织中作为社会中的神圣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从皇帝和教皇一直到农奴和奴隶，每个人在利用他的谋生机会的时候，都对上帝负责。在英国，商业的窃据，虽然在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了，但只是到乔治三世称帝的时候，才强大起来；一直没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当作像过去持久的制度那样加以承认和组织起来。想出它来的那些圣贤们，也像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宣称它是与教会无关的，并且立法者也可以不管它：它的活动是不受宗教信仰和法律所制约的。它在这些毫无隐讳的海盗式的措辞下，来保障人民的生计，但这种活动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它忠于迅速发财致富的原则的偶然结果。它要求人们容忍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上获得了成功。

本书的论旨，认为这种商业的窃据，虽然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它的主要目的，并且在许多地方，由于各种粗暴的情况，还违反了这个目的，可是，确实有一个时期，大约是在

19 世纪的中叶，那时可以说它在过去 100 年当中总结起来确为业已大大增加了的人口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惊人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就一直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地在后退，把它打击得越来越绝望的，就是它亲自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培养起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简单地说，它未到成熟就已衰亡了，在历史的记录上，资本主义将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纪元，而只是当作一个插曲，并且大体上，还是两个时代中间的一个悲惨的插曲，或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一位个别占有者承认自己是一个独裁者，我们根据即将说明的理由，必须补充说，这种独裁是阶级的独裁，在为私人利润服务的占有制面前，个别资本家也像工资劳动者本身一样，是束手无策的。他对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力量的控制，归根到底，并不比水手控制风力做得更好些。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占有者都成为了特权阶级的一个成员，并且由于这个阶级一旦放弃了它的特权之后，更有利的局面就会起而代之，所以，要这个阶级的各个和每个成员对这些特权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并不是完全不公道的。

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地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革命。

我们相信,现在最先进的民族,无论在知识上、品格上和智力上都已成熟，足以废除这种社会关系，以工业的民主来代替工业的寡头统治，以替大众服务的动机来代替金钱私利的动机。我们认识到,我们曾经有过,而且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现在还有着其他的独裁，比起骑在工资劳动者的头上占

有生产工具的独裁来，其动机还要恶毒，其后果带来还要大的灾害。这就是奴隶主对奴隶、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专制帝王或寡头统治对全体人民的压迫；这些压迫是建立在一个人或人数有限的贵族阶级、或其他只占少数的民族、阶级或信仰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上面。贯串在这些压迫制度之中时起时伏的，是家庭中男人对女人、父母对子女的专制。这些单独的、互不相同的人压迫人的形式，每一种都体现在特殊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的法律和惯例当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每一个民族中，都激起过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以纠正它的缺点。社会主义者，只要他们是忠实于社会主义所根据的民主主义的，都同情这些运动，并亟愿赞助它们。他们了解到，在社会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废除把人当作动产的奴隶制，政治民主的建立，以及妇女的解放，都必须在任何工业民主普遍实施之前实现。这一个或那一个比较显著的独裁的存在，掩盖了生产工具所有者对于那些依靠使用这些工具来谋生的人们的独裁，因而必然也转移了对资本主义特有的罪恶的注意。但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集中注意来面对着目前甚至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专制，即比较小的富人阶级对广大穷人群众的专制。

社会主义者控诉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以它作为基础的社会，共有四大理由 第一，历史证明，国家的贫困，虽然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部分的人民一旦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那末，即使生产总量相当巨大，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是永远受着饥饿的威胁。第二，在与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产阶级的享受和奢靡以及那个阶级里一些人们无耻的游手好闲相对照，这种贫困和它带来的风险，就更令人感到憎恨和侮辱。但资本主义的最恶劣的情形，还不是工资劳动者的穷困,也不是财产所有者的奢靡,而是,第三,在无产者和“靠占有权过活”的人们中间，存在着个人自由方面的显然的不平等。每天或每周靠接近生产工具以维持全家生活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一点钟又一点钟，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逐渐发现他们竟在那些占有这种工具的、人数相当有限的阶级的命令之下工作。而这些命令的制裁，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罚，乃是所谓自由抉择的结局——饿死。这就是工资劳动者所申诉的“工资奴隶”的意义。第四，社会主义者深信，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组织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一种方法来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并且是和人类的精神发展根本不相容的。

我们将在下面，把这显明的四害，即社会主义者所深信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先天具有而又可加以证明的四害，相继地加以研究。其中三种将首先论及：穷人的贫困、收入的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悬殊，这三种祸害都经常地与人民群众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的事实，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以后，我们将要指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增加国家的财富方面，虽然有过初期的成功，但结局还是失败，就是在提高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量到最大的程度这一点上，也是这样；因此，它不只是违反了它自己所抱的目的，并且，由于它完全倚仗着占有者个人金钱掠取的动机，变成了国民道德和国际和平的敌人，并且事实上也成了文明本身的敌人。

第一章
穷人的贫困

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突出的和完全出于意料的结果是，在国内产生了普遍的贫困。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在欧洲和美洲最先进的文明里，都同样地显露了这个事实，就是：普遍的贫困，这是由于厂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到处集中在相当小的有产阶级手中的结果，或者至少是它们带来的一般副产品。这当然不是说，很低的生活水平和迫切的饥饿的灾难，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生产工具公有的或生产工具较普遍地分配在那些赖以谋生的人们手里的、更原始的社会里，经常的贫困和周期性的饥荒，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在这些落后的社会里，生活的艰困和风险，还可以归咎于人们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的不足，如旱灾、水灾及疾病等；或归咎于天然物资的缺乏，如肥沃土地及矿产的缺乏，或气候的恶劣等；或者归咎于应用科学的未发达，以致人们不能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但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却把我们弄湖涂了。这种组织发展得最完备的国家，都享有丰富的天然物资，并大大地利用科学来使它们为人类服务。

就这些国家整个来看，这样生产的综合财富，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虽然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人民的物质状况，总的说来，却很少得到改善；有的时候，在无所约束的资本主义之下，实际上还要更坏。我们有理由认为：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的时代的英国，虽然存在着各种匮乏和有各种缺点，比起生产工具所有者和组织者的“自由企业”发展到最高峰的、19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来，为实际的多数人民供给了更多的食物，更有用的衣服，更多的光，更清洁的空气，更愉快的环境，并且，事实上甚至供给了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1. 工业革命的结果

这种越来越坏的情况的悲惨过程，在关于工业革命的一切记载中,都有所描述,在这个时候,资本家作为土地、机器和人的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者，称王称霸，同时又给普通人民带来了比任何战争所带来的还要惊人的长期痛苦。仅就英国来说，在现在的一代里，关于 1760 年到 1850 年间情况的叙述，已成了历史课本中索然乏味、令人生厌的教材，这不只是工人学习班的历史课本如此，甚至女子中学的历史课本，也是这样。但是，假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那末，在写到它的时候，就很难不动感情了。幼年儿童在纱厂里轮班地遭受摧毁；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

和铁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残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住宅里而沦于堕落；经常反复到来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死亡；食品掺杂，空气染毒，饮水玷污，日日夜夜见到的、听到的，都令人憎恶；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一再发现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黄色报纸的新闻记者，而是部会的视察员和议会的调查团。常被人们遗忘的是，类似这样的祸害，在今天欧美各大城市贫民窟的工业人口中，基本上还继续存在着，而其范围则肯定地大大超过了 1800 年到 1840 年间在同样条件下所发生的。

再者，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肉体的痛苦、事故和疾病，还不是它的最大祸害。“穷人的毁灭就是他们的贫困”这句话并不只是指物质方面而言。对于冰地上的英雄豪杰，或沙漠里的圣徒，生活条件的缺乏以及极度的艰难困苦，还可以借精神方面的兴奋、个性方面的发展和个人主动性与进取心的不断发挥，来得到调剂。对于古代社会里的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洪水、旱灾、瘟疫、畜疫或虫害，虽然可以产生浩劫或饥荒，也还可以产生友爱和鼓舞生活精神。可是，现代的工业制度，却一代又一代地摧毁着那些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们的灵魂。现在有一种道德方面的毒气，其能致人于死命不亚于物质上的毒气。就在我们的这个日子里，欧美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居民（他们的人数在一代一代地增加），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葬身在那鄙街陋巷的丑恶、秽浊和紊乱之中。他们从婴儿

时代起，就呼吸着酗酒的和色情的、偷盗的和欺诈的空气——虽然，可能偶然有个别道德超群的人，忧伤而又不沾染毒素地生活着，可是一般的人，在思想和肉体方面，都是中了毒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所抗议的贫乏，是品格的堕落，精神的败坏，人类个性本身的毁灭。

2. 这些祸害不是有意带来的

在本章开始的一句话里，我们提到资本主义的那些惊人的结果，都是出乎意料的。事实上，它们是太坏了，坏到在任何文明的阶段里都不可能由人们有意地把它们带来的；更不可能在富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绪、富于智力发展的热望的时代，如像从伏尔泰和卢梭到雪莱和柯布登的事业所标志的那个时代，有意地把它们带来的。正如易卜生戏剧里的法官所说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人干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做出来了，并且还继续在做着，这可由一个事实得到解释：资本主义最初的效果，还能和某些自然的结果相符合，还带有一点正义与合理的气氛，还能适合于人类尚没有受过教训的道德感，并且伴之而来的是对于企业的约束（指封建制度对于企业的约束——译者注）的崩溃—— 这种崩溃只有有经验的政治家才能了解其合理性。假使有甲乙两人，在其他条件相等之下，甲变成了穷人，乙变成了富翁，我们的正义感就会吃惊，我们的怜悯心和义愤

就会被激发出来。可是，假使在两人收入方面互相掉换了位置，甲和他的家庭却变得令人退避地肮脏、酒醉和愚钝，而乙却变得衣装整齐，并且邀请我们享受由他的衣服华丽的夫人和小姐们所主持的愉快招待；假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显地和直接地由于甲的生活超过收入过分挥霍，而乙则每年从事积蓄，那末，1000 人之中，就有 999 个人认为：这种恶果和酬报，具有诗意的公正；甲的穷困是咎由自取的，这穷困是对于他的罪恶的应得的社会合理制裁；任何人都能够像乙一样地得到兴旺，假使他们决心效法他的话。此外，假使乙推翻了一种很明显的封建专制，并为所有像他这样的人们，争取到了与他们的善良品质相称的优越的政治地位，那末，就会随之产生一种进步的和开明的有力印象。

除非不平等的现象，到了极不合理的时候，人们是不会怀疑甲的败落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也不会怀疑乙的兴旺乃是原因而不是结果的。如果一条街上的一个婴儿，在出生之前实际上就占有 100 万英镑，而一个从 8 岁一直辛苦工作到 80 岁的妇女却被别人所抛弃，以致死在劳动救济院里，那末，18 世纪的乐观主义就会开始失掉信心了。

3. 可是立刻被人宽恕了

可是，就在这种乐观主义已被动摇的时候，它也没有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降。它移转了它的阵地，并且开始辩护说：穷人的贫困，是人类状况的一般进步所无可避免的代价。幸运的人们，对于那些对别人遭受的苦痛作出解释的各种托辞，只要这种痛苦是为维持他们本阶级或本民族的利益或地位所必需时，好像是无止境地乐于接受的，甚至具有高尚理想和伟大志向的人们，也是这样。在美国南部拥有黑奴的州议员中，还有一些品德特别高尚、学识特别优良的人们，他们直到李将军在亚坡马托克斯法院里投降的时候，还热情地深信奴隶制度和奴隶市场是社会秩序唯一可能的基础，在他们的眼光中，这种秩序好像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东西。1914 年到 1918 年时，在德国的大学和军队里，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学识优良的人们，真诚地认为：对中立的比利时的侵犯，对占领地区的洗劫，对平民的强迫劳役，和对载客船只的轰击，都是德意志作为支配世界的强国，为完成其文明的使命所必须的但又是遗憾的附带事件。我们同样地看到：像布莱特和柯布登这样的爱国人士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好心肠的资本家，正在宽有和辩护那些与他们过去所斥责的奴隶制度不相上下的工人雇佣条件和居住条件，而这种情况，单就英国来说，在一年中所造成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死亡，就比克里米亚战争伤亡的总数还要多得多。而且，容忍这种大规模的痛苦和堕落并为之辩护的人，并不只是商人和贫民窟的房东。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和在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一样，科学界的人士和宗教界的人士——“海盗船上的教师和牧师”——都替他们自己世界里讲求实利的人们的行动作辩护。在知识分子中有李嘉图和纳沙·西尼尔，

在教士中有多马士·马尔萨斯和华德雷大主教，他们都把漫无约束的工厂、矿区和贫民窟里的恐怖——用‘工资的自然率”的名词把它抽象化起来——说成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现，和基督教会教条所启示的神律的一部分。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和“英帝国资源”的主要权威，对英国人说：“没有很大比重的贫困，富裕就不可能有，因为富裕是劳动的产物，同时劳动只能从贫困状况中得来。贫困是社会的一种状态和条件，在这种状态和条件下，个别的人是没有在贮备形态中的剩余劳动的，或者换句话说，他除了经常运用勤劳来取得酬报外，没有任何财产或生存手段。因此，贫困是社会中最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成分，没有它，国家和社会就不能够在文明的状态下存在。它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它是财富的泉源,没有它,就没有劳动,富裕,教养,享受,以及拥有财富者的利益，因为没有很大比重的穷困，就永不会使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以获取生活上的舒适或豪华。’[1]

4. 现代的辩护辞

我们决不能设想这些慈祥的、在别的方面都很优秀的公民,对于‘平民’的痛苦所表示的那种冷酷无情,只是过去的偶然事件。现在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一下他四周围的人们的心理,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或美国的‘富有’的或舒适的阶级，无论是工业家也好，领股息的人们也好，政治

家也好、教授也好，就很容易发现，他们是多么心安理得地以及想当然地认为：第一，有产者和无产者相对的地位，与他们的功过或种族的本质，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但却确实存在的关系；第二，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对于有产阶级自身的免于辛苦的体力劳动和个人能力发展的广阔机会——两者都被认为是文明和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一种必要的条件。因此，穷困，不断的匮乏，以及占很大比重的工资劳动者经常的窘迫的贫困灾难，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里，也都被默认为是广大人民注定的命运；这种默认，就是在这些祸害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充分表现出来之后，仍然存在。我们还记得一位机敏的日本政治家曾经说过一句使我们吃惊的话，他曾偶然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制度被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曾带来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贫穷阶级——在藩主时代和自耕农时代的旧日本从所未闻的一个阶级。这种穷困”，他又带着哲学意味微笑地补充说，“是日本为了增加它的重要公民的个人财富和为了使它自己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穷人的贫困，是牟取利润的资本家“自由企业”的最显明的恶果，这一点已不需要详细说明了。现在，抱着各色各样见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认这种贫困的存在，并且根据他们从过去二、三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所学到的心得，多少准备采取限制资本家自由经营的救济性措施，以图减少他们认为遗憾的现象。可是，这些减轻痛苦的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它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成就，也就是，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在所有信奉罗伯特·欧文关于工厂立法

的呼吁的地方，以法律来有意地维持整个社会文明生活的全国最低水平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得到了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见诸实施。这个政策，像现在大家普遍承认的那样，如果全部付诸实施，则国家（如果选择这样做的话），是能够制止任何普遍贫困现象的再度发生。就整个阶级来说，它甚至能够消灭那些接近贫困边缘的生活上的风险[2]。只要政治家们担负起这个任务，就是只做这么多，也会得到很大的收获。不过，这种平衡生活水平的过程本身（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平衡到一个规定的最低标准——譬如说，平衡到一个在正常就业情况下的熟练的工程师的或公立小学助理教师的水平），将不会减少，并且，正如我们将要指明的，在较长的时期中甚至还会增加资产阶级（即占有和支配生产工具的人数相当少的一个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即专靠别人的许可才能使用这些工具以谋取生活的人们）之间在物质条件和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注　释

[1] 派屈克·柯尔可洪：《英帝国的资源》（Patrick Colquhoun：*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1914，转引自毕尔：《英国社会主义史》（M·Beer：*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第 1 卷，第 145 页。

“这句名言，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唐森牧师说的，他曾用‘人类的祝福者’的笔名，著文反对‘贫穷救济法’。在他的曾经再版的杰作《论贫穷救济法》（*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伦敦，1817）第 39—41 页中（马克思在《资本论》英文版第 1 卷第 602—603 页中曾加以引证），他对我们解释说 穷人是不顾将来的，并且繁殖得很快，以便‘经常有一些人来担任社会中最卑贱最肮

脏和最屈辱的职位。因此，人类幸福的主要部分得以大大地增进，同时那些比较文弱的人，不只是可以免于苦役……并且还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他们本性所适合的各种职务'。贫穷救济法'势将摧毁上帝和自然在世上建立的体系，使它的和谐与美丽,对称和秩序,都遭到毁灭'。"(弗拉基米尔·辛柯维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Vladimir G. Simkovitch: *Marxism V. Socialism*〕,1913,第 107 页)。这位有教职的作者是'庇赛,威尔次的教区长,兼亚索尔女公爵琼恩的牧师。'他的'论贫穷救济法'是在 1786 年出版的，并在以后的 30 年中不止一次地再版。

[2] 关于这种政策的充分说明，以及它在实际情况下详细的应用，见维伯夫妇著：《贫困的防止》(*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 1920。

第二章
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相信，除了穷人的贫困以外，在目前资本主义工业组织更高的阶段里，一个人的收入与另一个人的收入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也是对于国家有害的。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现象，是尽人皆知的。在每张报纸里，资本家的也好，工人的也好，我们都时常看到在某些个人收入中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动人报道——从男女工人每周几个先令或几块美元的收入，到英美的超级资本家每年成千上万英镑或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但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社会中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间所分配到的国民收入的不平等[1]。就拿最富足时期的联合王国——即世界大战前的年代——作典型的例子吧。那时，这个国家的人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的总值，总计约 20 亿英镑；此外，从国外的投资吸收来的，每年约 2 亿英镑。全国人民赖以生活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的二分之一，是被社会中九分之一的人（当时有缴纳所得税义务的人们，即每年收入在 160 英镑以上的家庭）所取得了。在剩下的二分之一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约 3 亿英镑）分配给所谓新的社会底层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